

元曲家薛昂夫

臧克家题

杨镰 石晓奇

栾睿

新疆人民出版社

元曲家薛昂夫

杨 镰 石晓奇 栾 睿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 54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2 插页 240 千字

1992 年 3 月第 1 版 199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7—228—01806—0 / I · 602 定价: 3.95 元

序

有元一代，被称为西域人或色目人的维吾尔族作家，为当时的文学事业作出了贡献，这是历史所昭示的事实。薛昂夫就是其中一位工诗善曲，并且擅长书法的著名人物。

薛昂夫本名薛超吾，当时习惯取其名的第一字为姓，昂夫为字，号九皋；汉姓为马，故又称马昂夫、马九皋。这在我们今天已很明了，但自明以来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在这位作家的姓字问题上常有缠夹。例如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中就视马九皋、薛昂夫、马昂夫为三人，该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中评论说：

马九皋之词如松阴鸣鹤

薛昂夫之词如雪窗翠竹

马昂夫之词如秋兰独茂

如果我们要讥弹朱权，而且话要说得俏皮一些，或可借用“一气化三清”的现成说法。但也许我们还要感谢朱权，因为从他的谬误中，却透露出一个事实，薛昂夫用三个名字题署的散曲，分开来也定有相当数量，不然就构不成朱权的三种印象，加起来数量当会更多，决不止现存六十余支之数。朱权所说“松阴鸣鹤”，应该是豪放之意，而“雪窗翠竹”和“秋兰独茂”就当属疏宕的形象化说法。疏宕豪放确是薛昂夫散曲的主要风格。

但元末的杨维桢却以“蕴藉”赞许薛昂夫，他在《周月湖今乐府序》中说：“士大夫以今乐成（按：“成”当为“府”字之误）鸣者，奇巧莫如关汉卿、庾吉甫、杨澹斋、卢疏斋；豪爽则有如冯

海粟、滕玉霄；蕴藉则有如贯酸斋、马昂夫。其体裁各异而宫商相宣皆可被于弦竹者也。继起者不可枚举，往往泥文采者失音节，谐音节者亏文采，兼之者实难也。”杨维桢以“蕴藉”来概括薛昂夫的散曲风格，并与贯云石并举，固然可用仁智各见来解释，但薛昂夫的散曲中当也会有“蕴藉”之作。从今存薛昂夫的散曲看，杨氏之说也不无根据，比如《凌歊台怀古》以刘宋亡国，项羽末路来反衬伟大诗人李白同青山长存，固然有李白诗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为借鉴，但其描写手法却属含蓄蕴藉。而且我们还要估计到杨氏当年看到的薛昂夫的散曲当比今存的为多，事实上，说一位作家具有某种主要风格，并不排斥他的作品也有其他特色。从杨氏序文，我们还可知道，薛昂夫是当行的散曲家。元人喜欢把散曲（有时也包括剧曲）称作“今乐府”或“大元乐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被于弦竹”，也就发生“当行”“不当行”的问题。元代周德清在他的《中原音韵》中强调明腔识谱，强调“不伤音律”，也是有感于乖于音律的“劣调”之弊。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原音韵》这部著作的产生正是元曲大繁荣的一种结果，是从音律角度对元曲繁荣的一种总结，正如宋词繁荣后出现专门探讨词的音律著作一样。而这些著作反过来又会规范和影响创作。当然，协律虽是元曲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究竟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应该是它们的内容。至于像杨维桢所说的要求文采和音律两全为难事，倒也是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说，杨氏对薛昂夫的褒扬又应该说是一种较高的评价了。今天的文学史研究者，着重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散曲，当属本分，也不会招致非议，但如果我们能够懂得或者懂得一些元曲的音律，对研究工作当会更有裨益。

薛昂夫又工诗，赵孟頫《薛昂夫诗集叙》中称赞为“激越慷慨，流丽闲婉”。又王德渊也写有《薛昂夫诗集序》，见《天下同文集》。但从刘将孙为薛昂夫诗集所撰序文，知诗集名应为《九

皋诗集》，可惜今已佚失，我们只能从《皇元风雅后集》中略见一斑。萨都刺说薛昂夫的绝句“工唐体”，这是可信的。萨都刺本人就是宗唐的，后人称赞他和杨维桢“掇锦囊之逸藻，嗣玉溪之芳韵”，直以李贺、李商隐相比。元代不少诗人宗唐，实际上是对宋诗流弊的一种矫正，不过他们没有形成像明代前后七子那样的自觉的宗唐派别，更没有形成“复古运动”。当然，元人宗唐倒也不是“诗必盛唐”，这点也是和明代前后七子有别的。从赵孟頫诗序中“激越慷慨”的褒词看，薛昂夫或许受盛唐诗人的影响，也未可知。这还可从他“尝执弟子礼于须溪之门”窥知消息。须溪即刘辰翁，是由宋入元的著名词家，他对杜甫十分崇拜，还曾评点过杜甫、王维和李贺的诗作。如果说薛昂夫受到这位老师的影响，也不能认为纯属推测之词吧！

对薛昂夫的生平和作品，近五六十年来，由于研究者的努力，不断有所发现和发明，著名学者陈垣先生、孙楷第先生都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孙先生还论定薛昂夫为“元散曲大家”。但还有不少问题有待我们去探索，例如关于他的生卒年和具体的活动年代，他拜刘辰翁为师是在何时何地？他是否至正年间犹在世？署名“九皋”的作品是否即系他的作品？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正确评价他的作品，在这方面实际上是存在争议的。贬者认为他的作品大抵“貌为豪放，而实中无所有”；褒者却又认为他的一些作品意境阔大，气象豪迈，还有认为他的成就在贯云石之上的。这也有待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展开讨论，不断深入，有助于最后作出比较一致的意见。文学史的研究中并不注定要求对某位古代作家得出一致的意见，争论纷纭乃至成为千年公案也属常见。但文学史研究中却也约定俗成地有一种颇带规律性的现象：凡对某位作家基本上有定评，正是研究工作已经深入的反映，不管这种趋向深入的研究工作经历了多长的时间。而资料又是研究的基础。薛昂夫的作品散见于元明以来的有关总集、选集，虽说他的

散曲已汇总收入《全元散曲》，但人们总以缺少更便于翻检的别集为憾事。现在新疆人民出版社把薛昂夫的作品（包括曲、诗、词、文）辑为一册，实为功德无量的好事。作为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薛昂夫的辑本别集今天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版，就更有意义，它作为一个例子，再一次证明我国的各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我国的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的创造。

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学术事业的繁荣昌盛，也是为了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前我国学术界正在进行较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工作，并且业已引起国外汉学界的巨大反响。这项战略性也就是全局性的工作的完成，需要多层次的工作方式，需要发挥更多的学术工作者的积极性。新疆的同志所从事的包括薛昂夫在内的元代维吾尔族作家的辑本别集工作，正是当前古籍整理工作的一个部分。在这个方面说，他们的辛勤工作也就具有宏观的意义，更值得我们钦佩。

我对元代散曲、对薛昂夫无有研究，因此当杨镰同志受新疆同志的委托，嘱我写序时，实感意外，但辞不可绝，盛情难却，勉为作文交卷如上，错误之处，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邓绍基

导 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元代颇有个性化的维吾尔族文学家薛昂夫曾是个身影模糊，甚至略带有神秘色彩的人物。

清初文人吴亮中在其《南曲九宫正始序》中，引述了这样一则关于薛昂夫的轶事：

惟元有童童学士善度曲，每以不及见董解元为恨。又，薛昂夫词句潇洒，自命千古一人，深忧斯道不传，乃广求继已业者，至祷祀天地，遍历百郡，卒不可得。昂夫之后百年，至明而始有刘东生，颇为得之。尝抚膺自叹曰：“薛昂夫其在兹矣！”夫童童学士、薛昂夫之二人者，一慕夫往古，一慕夫将来。揆越皆百有余岁，其间正始之绪几湮，如是乎其危；得人之难，又若是乎其远也！

吴亮中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我们还未能弄清楚，但它无疑不是出于吴本人的杜撰。使我们深感惊异的是：这段话所记述的薛昂夫的言行，竟含有预言的意蕴。薛昂夫担心自己身后不被理解，不被承认；害怕岁月会使其名字销蚀，以至于“祷祀天地，遍历百郡”。然而事实正是：他的诗集仅比他本人多“活”了有数的几年，明初即无传本了。明初修《永乐大典》，辑入宋元人诗文别集极为丰富，其中就有贯云石的《贯酸斋诗集》，但没有收入薛昂夫名噪一时的《九皋诗集》。以唐代诗人薛能自比的诗人

薛昂夫，仅有一首《送僧》诗传世。他以半生之力，在江西南昌北门外建立了颇为巍峨壮观的碑亭，以保护其父“马清献公”的墓碑，希望其家世业绩能流芳百世，但他死后不久，由元明善著文、赵孟頫书写、郭贯篆额，号称“三绝”的墓碑和元朝的统治一同湮灭在一场广泛、残酷的易代战争中。作为元代重要的散曲家，仅以现存小令数量而言，薛昂夫之作本来排列为元曲家的第8位，但由于这些作品长期以来分属于“薛昂夫”、“马昂夫”、“马九皋”三人名下，分散了人们对他的注意。

正因为如此，在“导言”中我们准备对元曲家薛昂夫的生平及作品的研究史作专门的评述。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依次展开新的考证与新的研究。

一

元代文学的特点之一，就是涌现出一大批用汉语写作的兄弟民族作家。其中来自西域的维吾尔族功臣之后贯云石、薛昂夫，都是对整个元代文坛颇有影响的人物。他们有用汉语写作的诗文集行世，而且是重要的元曲家。并称为“蕴籍派”的代表^{〔1〕}，共同为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光明面——团结、进步、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历史必将为他们的特殊贡献记下有力的一笔。

薛昂夫，本名薛超吾，是所谓“西戎贵种”，“其氏族为回鹘（即维吾尔族）人，其名为蒙古人，其字为汉人”（王德渊《薛昂夫诗集序》）。依当时习惯，以名的第一个字“薛”为姓，表字昂夫，别号九皋，所以习惯上称其为薛昂夫。他又有汉族的姓——马，所以又被叫作马昂夫或马九皋。他生于元世祖至元初年，于元成宗大德年间初登仕途，同时开始发表作品，并汇辑其诗成集。他的仕宦生涯长达半个世纪，他的写作生涯也有半个世纪之

久。其家族与元代国运共终始，他个人的一生，经历了元代的开国、兴盛、衰败等不同的时期。

然而，与贯云石不同，长期以来薛昂夫的事迹隐而不显。关于薛昂夫的资料，往往不是语焉不详，就是互相抵触。早在元成宗大德年间，元代文坛就第一次得知了薛昂夫其人，然而，关于薛昂夫生平的疑问，也正是与此同时产生的。

元成宗大德年间，南宋亡国之痛已经相对减轻，读书人已经开始适应在新朝统治下生活，江西庐陵的凤林书院刊刻行世的《名儒草堂诗余》（或称为《元草堂诗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关于这本书，下文还要专门论及，这里只指出一个事实：在这部专辑刊宋代遗老“名笔”的词选中，竟选入薛昂夫的3首词。在选录这3首词时，注明作者为“九皋司马昂夫”。当然，首先得判断这“九皋司马昂夫”是否即是薛昂夫？答案是肯定的。在“九皋司马昂夫”名下，加注为：“太行畏吾儿”。“太行”，孙楷第先生判定为“太行”，即指怀孟路，而怀孟路（或称覃怀）正是薛昂夫家族人居中原的第一个落脚点。有人认为，据此可以证明，薛昂夫曾名为司马昂夫^{〔2〕}。这个论断缺乏必要的佐证。而前人早已指出，《名儒草堂诗余》的元刊本“鱼鲁颇多”，这里的“司马昂夫”，显然就是“马昂夫”之误。

元曲的权威著作《录鬼簿》也提到“马昂夫总管”，但天一阁抄本《录鬼簿》把他列为“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的第39名。而曹寅刊本《录鬼簿》，把“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分为“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和“方今名公”两大类，又把他列为“方今名公”的第7名。这说明，钟嗣成在初草《录鬼簿》时，对薛昂夫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

在元人散曲的选本里，薛昂夫、马昂夫、马九皋曾并见于一卷书中。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在“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一节，首列了“元（曲家）一百八十七人”，其中竟并列有：

马九皋之词，如松阴鸣鹤

(第 26 人)

薛昂夫之词，如雪窗翠竹

(第 41 人)

马昂夫之词，如秋兰独茂

(第 58 人)

以同一人占据了 3 个位置，这在全书是绝无仅有的一例，这样，所谓 187 个元曲家，其实只有 185 人。

由于对薛昂夫生平知之甚少，又将其一人之作分属三人，所以历代曲论家难于对薛昂夫及其作品给予足够的重视。

自从“五四”以来，对薛昂夫作过认真评述的，首推史学家陈垣。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问世于 1935 年，至今仍是研究元史、元代文学史的主要参考资料之一。《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文学篇》，在第一节“西域之中国诗人”里，陈垣对薛昂夫作了论列。他引据元人赵孟頫、王德渊等人为薛昂夫诗集作的序及刘将孙为薛昂夫作的“字说”，指出：

薛昂夫亦生于元初，科举未兴，未尝入国学，徒以爱慕华学，执业于宋遗民刘辰翁之门，其华学虽灿然有烂。赵孟頫所以惊为奇事，而深信学问之可以变化气质也。

昂夫诗集今不传，昂夫诗吾亦未一见，然由赵、王两序之保证，不能不认为西域诗人之一，固不得以其诗之不传而屏之也。

但陈垣仍在卷四第 5 节“西域之中国曲家”列入马九皋，并指出马九皋或即马昂夫，曾任三衢守，后任太平路总管。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孙楷第先生发表在《文学评论》1959年第4期的薛昂夫考略，是关于薛昂夫生平最重要的一篇论文。此文后来收入《元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月初版）。孙楷第不但论证出薛昂夫、马昂夫、马九皋为同一人，还首次列出了薛昂夫的仕履：初为江西行省令史；后入京，由秘书监郎官转佾典瑞院事；出任太平路总管；元统年间为衢州路总管。这个仕履比陈垣所叙要丰富、详尽一些。

日本的《东京支那学报》1963年第9期，发表了日本学者田森襄的《马昂夫传略》一文。据此文，田森襄并没有见到孙楷第发表于4年前的论文。田森襄依据大致相同的资料，得出了与孙楷第相同的结论：薛昂夫、马昂夫、马九皋为同一人。田文对薛昂夫在三衢的活动着墨颇多，但仕履仅列出衢州、太平两地。据文末所注，田森襄当时是日本埼玉大学助教。在全文结束时，田森襄指出：“我感到特别遗憾的是：在马昂夫与同是畏吾（即维吾尔）出身，因而不难想象与他会有交往的贯云石之间，竟然搜寻不到片言只字资料。”

此后，薛昂夫日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香港《海洋文艺》1977年第4、5期刊出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罗忼烈的长文《维吾尔兄弟民族的两位元曲家》，此文前半部论贯云石，后半部论薛昂夫，后收入《两小山斋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7月初版）。罗文对薛昂夫在元曲家中的地位，作了认真细致的论证，并据王德渊为薛昂夫诗集作序时，薛昂夫为31岁，薛昂夫早年曾拜刘辰翁为师这两条资料，推断他应生于元世祖至元十年（公元1273）左右。

白寿彝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元代）于1985年7月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不但介绍了薛昂夫的生平与创作，还收入薛昂夫的作品（诗1首，词3首，小令65支，套曲2套），并附录了有关薛昂夫的原始资料。本书卷十三是迄今为

止最详尽的薛昂夫评传，也是第一次把薛昂夫各类作品汇辑在一起，为人们全面认识薛昂夫，提供了较丰富的依据。但本书也存在一些问题。除把元代的回回都称为回族这一前提肯定会有异议，而且将薛昂夫判定为回族的依据是什么，文中并未明言。或许是因薛昂夫汉姓为马而得出的这一结论。但汉姓为马的元代文人还有马祖常、吉雅谟丁（即马元德）、迺贤（即马易之）等人。另外，《全元散曲》收入的薛昂夫套曲为3套，不知《回族人物志》（元代）为什么只收入2套。附收的关于薛昂夫资料颇便于读者参阅，但其中出自《水云村泯稿》卷7的《九皋苍山诗选后》，显然与薛昂夫无关。《水云村泯稿》作者刘埙生于南宋理宗嘉熙四年（公元1240），至少比薛昂夫大30岁，当然不会称薛昂夫为“诗翁”。这里的“九皋”，应是宋代遗民。此外，行文中尚有错讹，比方附录的王德渊《薛昂夫诗集序》，依据《雪堂丛刻》本校点，但《雪堂丛刻》本的王序整整排漏一行（第11行），致使行文文意不通。

为了完整地介绍薛昂夫生平的研究史，我们认为必须提及宁希元先生的《薛昂夫行年考略》。《薛昂夫行年考略》，于1986年5月打印成册，提交“元代西域作家学术讨论会”（由新疆师范大学举办）。本文是孙楷第的“薛昂夫考略”发表后，提出新见解、引证新资料最多的一篇。宁文指出：薛昂夫应生于至元四年（公元1267），曾为国子监生，其家庭曾遭受过巨大的不幸，至治元年（公元1321）外放为永州路总管，至正二年（公元1342）前后，曾任建德路总管，是为其最后官职。宁文力图开拓视野，即便对前人引证过的史料，也希望能作更深的理解，曾任建德路总管一条出于孙楷第所考之外，但是对其他行文中的一些论断，我们认为有认真探讨的余地。有关的分析与辨证，请参阅“史料与考证”章。

此外，近年来发表的关于薛昂夫的论文还有：众毫的《回回

散曲大家马九皋》(《宁夏日报》1980年9月9日),白崇人的《松阴鸣鹤 秋兰独茂——元代著名回族曲家马昂夫》(《朔方》1980年第10期),试骏的《试论马九皋及其创作》(《宁夏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郝浚的《元代维吾尔族文学家薛昂夫诸考》等。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对薛昂夫的生平与创作作了评介与考辨。

自孙楷第先生的薛昂夫考略发表以来,对元曲家薛昂夫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关于薛昂夫生平,仍有很多难点未能弄清楚。我们的研究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我们力图通过本书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新的研究与新的发现。

二

根据有关文献,可知薛昂夫在世时,曾将诗作结集为《九皋诗集》(或题为《薛昂夫诗集》),将词曲结集为《扣舷余韵》。

《九皋诗集》编成于薛昂夫31岁时,但此书从未见著录,当散佚于元末。至于薛昂夫31岁以后写的诗是否结集,目前尚未有任何线索。孙存吾《皇元风雅》后集卷一收有薛昂夫《送僧》诗一首,清人席世臣补辑的《元诗选癸集》也收有此诗。长期以来,作为一个诗人,薛昂夫仅有这一首诗传世。所幸的是,有3篇为薛昂夫诗集写的序,一直流传到今天。他们是:王德渊《薛昂夫诗集序》(见《天下同文》前甲集卷十五),赵孟頫《薛昂夫诗集叙》(见《松雪斋集》卷六),刘将孙《九皋诗集序》(见《养吾斋集》卷十)。

薛昂夫的词,今天能见到的仅有3首,就是收入《名儒草堂诗余》卷上的那3首。以后的《词综》、《历代诗余》等选本,也都据《名儒草堂诗余》选入了薛昂夫的词作。

薛昂夫以散曲作家见知于元代曲坛，几乎一切元曲总集中都选有其作。据同时代人张可久的《小山乐府》，可知薛夫曾将词曲结集为《扣舷余韵》。张可久写有题为《题马昂夫〈扣舷余韵〉卷首》的〔朝天子〕曲。据张可久题曲，可知此集收入的应是薛昂夫退隐林下时的作品，不是他一生之作的结集。《扣舷余韵》与《九皋诗集》一样，未见著录，当散佚于元末的战乱中。

第一个将薛昂夫之作辑为别集刊行的，是近人卢前。卢前辑有元明人散曲总集《饮虹簃所刻曲》，其中有元人张养浩、乔吉、张可久 3 人的散曲别集，未编入马昂夫之作。《饮虹簃所刻曲》刊行于 1936 年（系金陵卢氏自刻本）。此后，卢前又从《阳春白雪》、《太平乐府》、《北宫词纪》、《词林摘艳》等书，辑出署名马昂夫或马九皋的小令 38 支、套曲 3 套，编成《马九皋词》一卷，并于 1944 年把它送给了民国政府参政达浦生（回族）。1946 年 6 月，卢前陪于右任西出嘉峪关，巡视新疆。在此期间，他向当地维吾尔族上层人士出示了自辑的《马九皋词》，并引起了重视。当时的新疆监察使麦斯武德为《马九皋词》写了序^{〔3〕}，并希望能刊印此集。于是，卢前于回南京前夕——1946 年 8 月 5 日——在乌鲁木齐为《马九皋词》写下第 2 则跋语，并约定“东归三月”之后，即以刊印好的《马九皋词》“寄致玉门关外”。于是，卢前于南京仍以饮虹簃名义，刊刻（木版印制）了《马九皋词》。由于此集未收入《饮虹簃所刻曲》，而此后不久新疆政局就发生了重大变故，所以卢前辑刊的《马九皋词》传本不多。而且，由于那时尚未弄清楚薛昂夫与马昂夫是同一个人，所以此集未收入署名为“薛昂夫”的作品。

隋树森先生的《全元散曲》首次把薛昂夫、马昂夫、马九皋名下的散曲，全都归于薛昂夫。《全元散曲》收入薛昂夫小令 65 首，套曲 3 套。除了收入作品最全之外，《全元散曲》还对收入的各篇作了精细的校勘。自其问世后，其中收入的薛昂夫散曲，

就成为研究、认识薛昂夫的基础。

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88 年 5 月出版了由陆邦枢、林致大校注的《薛昂夫赵善庆散曲集》。本书作为“元明散曲集刊”的一种行世。这是薛昂夫散曲的第一个注释本。书中所收的作品，是依据《全元散曲》排印的，注释简明扼要，有助于理解文意。但这本书漏掉了一首小令，只收小令 64 首。除薛昂夫散曲，书中尚收有元人赵善庆散曲，计小令 29 首。书后附录有孙楷第的薛昂夫考略，赵孟頫的《薛昂夫诗集叙》，萨都拉的《寄马昂夫总管》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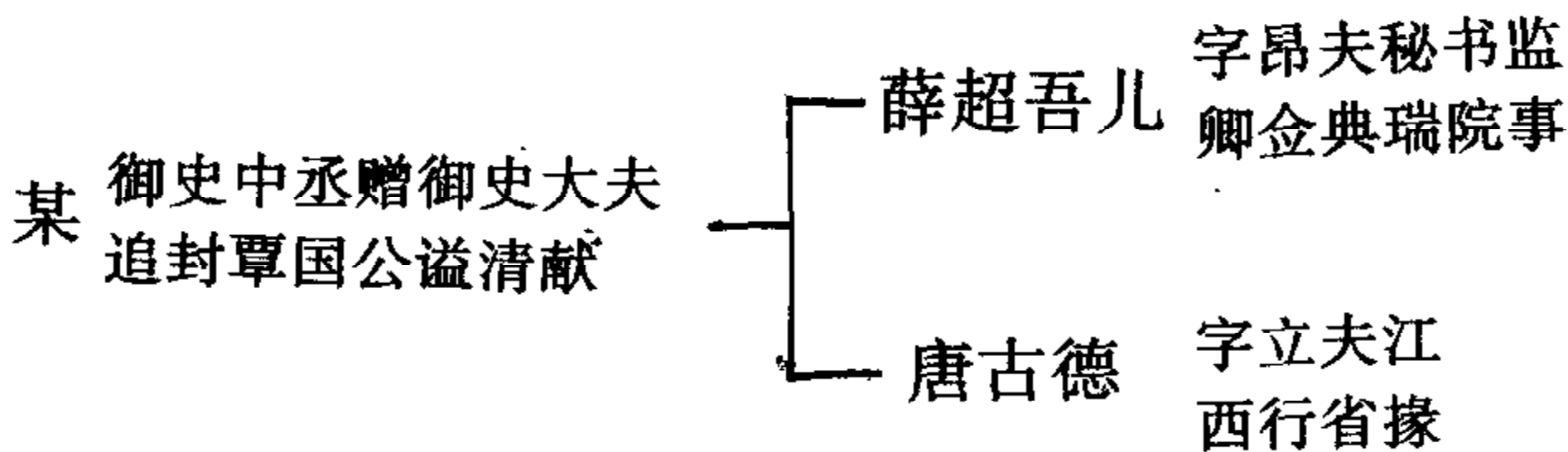
如前所述，首次把薛昂夫各类作品汇为一集的，是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元代）。在《回族人物志》（元代）的附卷之一“遗文”中，收有薛昂夫诗 1 首，词 3 首，小令 65 首，套曲 2 套。本书卷十三“马九皋”中，提到了薛昂夫的一篇文章（《薛超吾尔记》），但在“遗文”之中，却没有收入此文。

作为散曲家，薛昂夫留下的作品不算少，仅次于贯云石，是名列第 2 的西域曲家。但作为诗人、词人，留传至今的作品就少得可怜了。就创作实践而言，他可以称为元代杰出的诗人，词人，我们希望今后能读到他更多的诗、文、词等作品。

三

当我们决定提笔写作这本《元曲家薛昂夫》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与前人相比，我们能够提供多少新的内容呢？

第一个指出薛昂夫为“马氏”的，当推清代学者钱大昕。他的《元史氏族表》卷三，在色目人部族无考这一类中列有马氏，并说：“马氏有封覃国公者，葬于龙兴北门外。其子唐古德与吴澄游。”为马氏列表如下：



钱大昕所列的表是孙楷第考证薛昂夫即马昂夫的出发点之一。此后，这一表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并多次被引证。但被忽略的是：从未有人指明钱大昕的资料来源。应该说，钱大昕的《元史氏族表》是资料丰富、内容精审的著述，其中颇有出于前人已知资料之外的提法。除马氏这一条使人难以索解，还可举出另外一例：元代维吾尔人士鲁明善著有《农桑衣食撮要》，历来认为鲁明善生平不详，《四库全书总目》也说：“明善，《元史》无传，其始末未详。”但钱大昕《元史氏族表》却独称鲁明善任靖州路达鲁花赤。现在我们已经考知，这条资料出于虞集的《道园类稿》。《道园类稿》卷四十三有《靖州路达鲁花赤鲁公神道碑》。由于《道园类稿》传本极少见，连《四库全书》也未收入，所以《四库全书》馆臣竟认为有碑传传世的鲁明善“始末未详”。无疑，钱大昕在编《元史氏族表》时，曾利用过《道园类稿》。他不但据此注明鲁明善官终靖州路达鲁花赤，还据此为马氏列了上述一表，因为关于薛昂夫生平最重要的资料《马清献公墓亭记》正见于《道园类稿》卷二十五。这一墓亭记从未见研究者引称。

另外，我们还利用遍阅元人诗文集的机会，尽量收集了有关薛昂夫的资料。

我们可以准确而详尽地排出薛昂夫的仕履；

我们可以对薛昂夫的家世、族别、宗教信仰提出全新的说法；

我们能够指明薛昂夫后人在元明易代的社会动乱中的处境；
我们能够使薛昂夫为人、思想等潜在因素显现在历史背景之前；

我们能够证明，所谓薛昂夫曾任职永州或“潇湘郡”的说法是错误的^{〔4〕}；

我们已经探悉，“秘书监卿”是其最后历官，至正初年，他即以此职衔致仕；

我们已经查明，所谓薛昂夫曾任徽州达鲁花赤一说是笔误所致^{〔5〕}；

除《送僧》之外，我们又辑出他的3首诗，还有2则断句；
我们辑出了他的3篇文章；

.....

总之，我们为写这本新书，作了大量的资料准备。

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把薛昂夫和他的时代结合起来。他是元曲家、诗人，他是出身于“色目世臣”家族的兄弟民族元曲家、诗人。他和他的家族人居中原，参与了中原的政治文化生活，是元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他的家运和元代国运是息息相关的，而元朝皇室被逐出长城，复归漠北，他的名字却永远被载入中华民族的文学史，他的作品却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学遗产。他的家族覆灭了，整个元朝统治倾覆了，他却在这个“废墟”上，以另外一种面目站立起来。这就是与其他元曲家、诗人的不同之处，这也是与其他兄弟民族作家的不同之处。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满足于考证他的生平，评述他的作品，我们将力图透过零乱的史料捉摸住他思想的脉络，力图凭借他的作品复原出他心灵的透视。我们希望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能获得一些有益的东西，都能为其解答一些疑难，又由此而提出新的问